或许对于那些自认为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已有了不同于官方口径的认知的人来说，《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陕西农村72名曾活跃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妇女的生活变迁史所展现出的有关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性别的历史并不会感到出乎意料。但像作者写道的一样，证实我们已经准备好去了解的事常暗含着作出这种阐释的危险，即对细节、差异的忽视，造成认知上的简单化。

政党的施政纲领、政治宣传与最终现实之间的差距是现代政治中普遍存在甚至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倘若在长时间里只存在着唯一的执政党，且具有政治地位与权力上的超然性，那么党会倾向于最大程度上以行政、教化等力量在公共领域消除不利的历史痕迹，重塑起“光辉”“正确”的集体记忆。不过这不会是没有代价的，透支的信用最后会累积起一笔无法偿还的利息。

历史效应的延续性与整体性都不同寻常（其实也可认为没有什么是否“寻常”，只要将其视为坐标系的错置），在前者的作用下，我们能从作者的记述中看到，那些被党宣传为“封建道德”的评价体系如何继续在革命时期的农村地区继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以及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如何从“旧社会”的更公开的形式向较为隐秘模式的转变；后者则体现在，“进步”或与之相反的变化一般同时作用于社会的全体（但不一定以均等的形式），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都无法获得被许诺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显著上升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的时候，那些承诺给女性的权益，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便出现了不可解决的疑问。也许并不完全如作者所言，农村妇女是毛泽东统治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是在满是灾难的艰难时期，任何一点有生的力量都对尽可能地从死亡处远离不可或缺，更何况是那总人口数一半的女性。

口述史提供了生动、富于情感、大量细节的第一人称史料，这是现代历史学研究者的独特优势。当采访对象是数量庞大的“普通”人（相较于位高权重或声名显赫者而言）时，是否正是这些琐碎、零散、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叙述，影响了作者行文风格，使得分析中也遍布了小径与岔道。